

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吴家庆 瞿 红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取得政权后70年的时间里将中国打造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党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核心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党领导下形成的制度优势,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使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科学地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要继续强化党的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助力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将“两个维护”落到实处,将党的思想建设抓到实处,并不断强化党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关键词] 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本质特征 制度优势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9.05.013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者与完善者,将领导原则、党风传统、价值理念等渗入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中彰显出了系列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准确领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重要命题的深刻内涵,对于坚定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制度优势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资源优势

政治资源是政治行为主体(政党)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作用于政治客体的手段和工具,既包括

国家机构、国有资产、大众传媒等物质性资源,也包括政治文化、政党公信力、国家制度等非物质性资源。其中,国家制度是执政党为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经济社会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率发展而制定的规则体系,是政治资源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国家制度应实践需要而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和文化土壤中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研究”(项目编号:15ZDC001)和2017年湖南省社科规划办智库专项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依据和深刻内涵研究”(项目编号:17ZWA16)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变化中的世情、国情、党情,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领导建立的最合乎中国国情与发展需要的制度模式,在实践中展现出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优势

我国在经济社会各方面能够取得突出成就,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以下三大优势。

1. 自我完善发展的优势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生产关系必然面临着生产力变迁的挑战,上层建筑必然面临着经济基础变迁的挑战。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虽同样面临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变迁的挑战,但这不是覆灭性的挑战,因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从根本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够在维系制度基本特征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调整来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迁,即通过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根本性变革,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巨大优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因为缺乏经验,也导致出现一些严重背离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使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对此,党迅即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纠正自身在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使国家经济发展回归正轨。

这样的自身纠错和自我完善,很好地体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中央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削基建、保生产”为主线,重新规划各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来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系列举措中。

这样的自我纠错与自我完善,同样也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纠错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之中。针对单一的公有制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现实,针对平均主义“大锅饭”带来的活力不足的现实,党中央大胆探索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通过大胆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破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固化认识,破除了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体制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优势同样也体现在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区域、领域、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各产业部门资源有效利用率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社会各方面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对此,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命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为指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转方式、优结构、换动力、扩内需,为应对经济风险与挑战,化解各方面矛盾,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2.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使社会逐渐演变成由诸多相互冲突的单个意志联结而成的结合体,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世界大舞台上占据发展的制高点,必须将分散的社会意志凝聚成一股合力,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智慧与力量集中地朝预期的方向涌入。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人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人们没有也不可能共同理想……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能够凝聚目标共识,还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②。

以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政治为指针凝聚目标共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工农、知识分子、干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解放军、归国华侨等绝大多数人民拥有以代表大会的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监督国家机关职权行使等权利。同时,秉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①这一理念,不断健全政治协商制度,使各党派、团体等方面代表能够真正参与到对社会各方面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中。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强化了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在统筹各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有效化解了各方面矛盾冲突,使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赢得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支持和参与。

以“计划”为纽带整合社会资源。对人力、物力、财力等各项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统一配置,是将人民日益高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至最大功效的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我国始终高度重视“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建国初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发展方针,以“五年计划”的形式成功将贫乏的社会资源汇聚于国防和重工业领域。改革开放以后,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认识到了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同时也强调此举必须在坚持“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②的前提下进行,以切实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和国家持续推进“计划”手段在实现形式上的创新,力图形成张弛有度、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宏观调控体系,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保证发展的大方向不动摇。

70年风雨兼程,通过发扬民主将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紧密团结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再以“计划”为手段将有限的社会资源集中于最紧要的建设任务,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均办成了诸多令世界瞩目的“大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研制的“两弹一星”和建立的千余个工矿企业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经济特区和自贸区的设立,国际性赛事和会议的举办,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质量均实现了质的跃升。进入新时代,在精准脱贫、化解过剩产能、“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超预期成

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优势

公平和正义是自古以来人们的共同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贯穿于各环节,不仅注重捍卫全体社会成员在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的平等地位,还高度重视个体间存在的差异,强调通过对弱势群体进行帮扶这一正义原则切实有效地实现社会的公平,彰显出与资本主义“大众福利”政策有着本质区分的巨大优势。

这种优势表现在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倾斜的分配制度上。我国以基本经济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权利,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拥有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获取生存资料的机会,并通过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准入规则和竞争制度,为每个社会主体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提供了条件。同时,通过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和转移支付制度、税收调节制度等,有效规避了基于个体差异而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这种优势表现在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公正的社会规则上。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从各方面保障了公民平等地享有人身自由权、信仰自由权、监督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同时,通过完善检察制度、审判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公证制度、国家赔偿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切实保证了相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通过不断健全监督和惩戒机制,有效抵制了“特权”和“潜规则”势力的蔓延。

这种优势还表现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协调发展战略上。我国不断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失业、工伤等保险制度,救助、福利、慈善、优抚安置等保障机制,保障相对弱势群体的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3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本生活权利。同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和东中西部之间在经济活力、文化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差距,从教育、产业、兜底、搬迁、生态等方面卓有成效地实现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二) 制度优势本质上是党的领导优势在制度层面的反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诸多优势,其中,党的领导是最大优势。正是在党的卓越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形成并不断完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1. “从群众中来”的领导原则和新老干部团结互助的党风传统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发展的优势

“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领导下既能保持稳定又能保持连贯,就在于制度本身科学而正确,推行制度的人先进而团结。

以实际调查和人民福祉为出发点保证了制度不出错且行之有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诉求代表着社会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构筑了覆盖全面的密切联系各方群众的网络结构,并在执政过程中坚决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②的工作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制定,就是党倾听群众的呼声与心愿,在综合各地实际情况和各方人士的意见的基础上形成草案,再在各地区各部门中组织多次讨论和修改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既合乎实际发展需要又贴合人民群众的期待愿景。

重反思调整和“新”“老”互助保证了制度的灵活且连贯有序。党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③,更表现在他们能够根据实践的变化对过去作出的决策自觉地进行反思与总结,“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④,使各项制度政策得以随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修正和完善。同时,以“老”带“新”是党的优良传统,为各岗位领导班子间实现稳步交接而不影响已有制度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

2. 党自身的优良形象和宣传动员群众的独特方式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统一的思想才能产生统一的行动,而思想从根本上形成于主体对客体的理解与认知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将“各自为战”的人民联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将分散的社会力量集聚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方向,就在于党的先进性为群众所认可,党的政策主张为群众所认同。

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组织性铸造了崇高的群众威望和强大感召力。中国共产党是由人民群众中最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战士,广大党员不仅思想政治觉悟高、专业素质强、群众基础好,且具备应对各方面风险挑战、促进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维护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基于此,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组织以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为保障,不断拓宽党员发表意见和贡献谋略的路径。同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制定了系列党纪党规和监督制度,并严惩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使党员干部队伍既有勇有谋,又能坚定政治方向、严守政治规矩。品质优良、作风淳朴的党员队伍,纪律严明又不失活力的党的组织,极大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和吸引力,使广大群众信任党,愿意跟党走。

庞大的宣传团队和群众化的宣传方式铸造了广泛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向心力。为使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党要求广大宣传工作者注重对宣传对象的调查研究,在较全面掌握宣传对象的思想觉悟、文化程度、兴趣爱好和语言特色等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宣传教育,力求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大众化的语言、群众化的方式讲通讲透,使群众明白政策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深入浅出的宣传教育加深了群众对党的主张的理解和认同,也为构建全党全民同心同德共同奋进的政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1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局面提供了思想保证。

3. 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模式和为民服务的党性规定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优势

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公平是效率的保障,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稳步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避免财富与资源被“少数人”侵占,就在于党既有“做大蛋糕”的能力,也有“分好蛋糕”的决心。

集中统一且权责明确的工作系统保障了决策与执行的高效率。中国共产党在各机构实行党委领导制,要求一切大小事宜必须经由党委会集中讨论决定,凡集体通过的每一项决议,均合理划定任务、分配人员,规定数量、质量和时间,并由作为集体核心的党委书记统筹全局负总责,各党委委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事后按规定对尽责者给予奖励,对失责者进行惩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既能保证党内认识与行动的统一,又能激发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既能保证“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①,又能有效避免相互推诿、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沓沓等弊病,形成了高效率的决策与执行系统,保障了改革发展效率。

“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保障了人民共享发展机会与成果。“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②,始终将回应人民诉求、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革命时期,党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③,组织全党上下积极学习生产知识,指导并帮助人民破解生产难题。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④,要求党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⑤,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⑥,并最终全部体现到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党将其人民性贯穿于各项工作,有效保证了社会财富和发展机会由全体人民共享,最大限度地维系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集中体现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全新发展阶段,正是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现实例证。

(一)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关键在党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摆脱被列强侵略凌辱的处境,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肩负的首要任务。为此,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与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基于前人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从制度层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与创新,才能真正挽救民族危亡,并在红色区域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实践,充分展示出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是封建旧制度的翻版,也不是压迫剥削人民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权力向人民的回归,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先进制度,借此团结起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为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中国共产党继续组织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标志,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历史发展的车轮推进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新的目标要求。1962年,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⑦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问题”^①，力图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发展。但由于在实践中错误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严重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并强调“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②。在经济制度上，提出变“单一的公有制”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颁布若干项法律法规切实保障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的合法权益，使市场活力得以全面激发，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发展与完善也从不同侧面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保障和条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③。

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引向深入，领导党和人民在经济建设、科技创新、民主法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生态文明、强军兴军、从严治党、祖国统一等方面完成了深层次的变革，积淀了雄厚的经济、科技与国防实力，文化软实力也不断增强。在国内，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指日可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28.6%和31.2%，接近联合国所划分的“富足”标准“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累计下降7.1个百分点”^④。在世界发展的大舞台上，中国在诸多领域已逐渐“从学习型、跟随型的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⑤，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中华民族正在“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基础上向“强起来”迈进。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关键在党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是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科学理论。在其指导下，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在曲折中前进，同时，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也进一步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兴起。20世纪初，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秉持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的理论态度，领导俄国民众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形成了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列宁主义。俄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惊人成就又进一步吸引了东欧、南欧、中美洲、亚洲部分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新阶段。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东欧遭受挫折，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趁势发布的诋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言论，严重动摇了各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在共产党人内部也出现了各种所谓“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困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还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科学高效、运行有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其效能，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发展奇迹；相比于西方国家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社会主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呈现出稳健且势头正好的发展态势。中国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昂首世界，展现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不容置疑的正确性，抨击了各种唱衰社会主义、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恶言，扭转了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失语”的境地。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于2018年5月5日《人民日报》。

④ 《2017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046万人》，参见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01/c_1122353906.htm。

⑤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载于2017年12月21日《社会科学报》。

(三) 中国的成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关键在党

中国智慧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将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设成为国强民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总结,中国方案是党和人民基于中国智慧对当下面临的世界性难题所主张采取的态度和解决方法。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和期待。

中国的成功为世界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和模式借鉴。20世纪80年代末,在英美等国的宣传鼓动下,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纷纷推行“华盛顿共识”,实行以市场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转轨政策,政治上则追求快速民主化,但由于各国国情具有特殊性,实践中形式与内容的脱节反而导致其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保证了社会主义方向的不动摇和发展战略的科学性、连续性。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制、打击、渗透,中国共产党坚决奉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秉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领导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将社会发展要求与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阶级构成相联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社会活力得以全面迸发,社会资源得以高效配置,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中国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各国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在先进政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与模式。

中国的成功为解决世界性难题与挑战提供了新理念、新思路、新示范。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继续维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式思维方式给世界发展制造麻烦,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理念,坚持“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①,在平等协商、交流互惠的基础上同各国展开友好合作,并设立“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平台,让沿线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以身作则地推动建立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方面,倡导各国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协调推进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中国的引领与倡议下,构建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共赢代替独占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平等对话、公平互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逐渐成为各国人民的广泛共识。

三、继续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制度优势作用的发挥,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时代背景下要完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民族复兴梦想,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一) 全面落实“两个维护”,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统一高效的政治环境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指出: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②。“两个维护”将“领袖”权威和党中央权威置于同等高度,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不仅要服从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集体领导,也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的最核心地位,这既是党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形成的独特优势和宝贵经验,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坚持“两个维护”,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新时代下党中央对近9000万党员干部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落实“两个维护”的思想基础。增强政治意识,就要坚持从政治的视角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增强大局意识,就要自觉从大局出发,准确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整体态势。增强核心意识,就要从历史的维度深刻理解“领袖”核心和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

②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载于201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党中央”核心形成的必然性,并将服从、维护“核心”落实到行动。增强看齐意识,就要培育向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的思想自觉,形成“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①的行为自律。

坚持“两个维护”,必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也是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党中央要以“两个维护”为导向,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和各项体制机制,并通过增强法规的执行力度,维护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等的严肃性与权威性,避免“破窗效应”;另一方面,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办事,做到不逾矩、不越权、不违规。此外,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党员领导干部按规定进行惩处,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切实提高全体党员的纪律意识。

坚持“两个维护”,必须将“两个维护”作为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考核标准。党员的政治素养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直接因素。革命年代,为克服农民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对党的影响,在如何选拔和培育党员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从思想上入党”的重大命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各种思潮相互交融,在吸收新党员方面必须更加重视对候选人的思想考核,将是否维护“党中央”权威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领导地位作为思想上入党的第一标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②,党员领导干部是坚守社会主义方向、推进各项事业的决定性力量,为此,必须将政治标准、政治要求放在第一位。“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③

(二) 夯实全党的思想基础,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造一支信念坚定、思想先进的模范带头队伍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否坚定直接关乎民族复兴事业的

成败。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各领域的“硬骨头”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面对这些难以“啃”掉的“硬骨头”,一些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漠,对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仅仅停留于表面或寄托于神灵,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与声色的诱惑,出现了思想颓靡、精神懈怠、脱离群众等影响全党士气的突出问题。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必须首先推进党的思想建设。

推进党的思想建设,要抓好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理想是信念的存在依据,信念是理想的有力支撑。坚定理想信念,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搞懂”“弄清”,真正从源头上解决理想信念“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要培育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从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准确把握理想信念在不同时代的表达与展现。要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与理解,准确把握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条件和要求,“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⑤。

推进党的思想建设,要深入社会实践,化解思想危机。党的思想建设不应止于理论,更应深入实践。马克思虽强调“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⑥,但再彻底的理论如果不与实践相结合将永远只能是一纸空文,被灌输的理论往往也只有在同现实的碰撞中才能真正被认识和理解,变成改造世界的力量。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必须深入实践,通过与人民群众的真

① 习近平《办公厅工作要做到“五个坚持”》,载于《秘书工作》2014年第6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第11页。

切交流,通过对时代变迁的亲身感悟,感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魅力,避免因理论认识不够而对理想信念产生怀疑甚至否认的现象;必须深入对社会现状的调查研究,在实践中探寻破解危机难题的办法,切实克服思想上的畏难情绪和动摇危机。

推进党的思想建设,要增强党性修养,提升政治定力。党性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和风貌,是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各级党组织必须全面落实“三会一课”活动要求,及时了解支部成员的思想动态,抓住党课的契机让党员的党性教育常态化;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各项准则、条例,督促党员深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广大党员必须自觉强化党员意识,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将红色精神永驻心间,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必须努力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知识,不断提升工作和办事的能力,争当“勤政务实、敢于担当”^①的好干部。

(三) 创新意识意识形态工作路径,强化党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营造一种上下齐心、团结奋进的社会氛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通过国际贸易、文化交流、内政干预、国际规则制定等多种方式加紧向中国传输西方价值观,企图从意识形态领域颠覆中国,国内改革的全面推进所带来的利益分化也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思想冲突与隔阂。要巩固和加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将分散的社会观念和利益诉求整合成一股合力,必须革新话语体系,紧握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指由“与意识形态传播和宣传相关联的话语主题、话语主体、话语载体、话语方式、话语空间等要素”^②构成的有机语言结构整体,话语权是指对事物发表看法的权利,以及话语潜在的现实影响力。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冲击,与时俱进地革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③作为构建主流价值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且易于接受的语言形式进行表达,推动话语体系风格从“高大上”向“接地气”转变。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增加话语的历史厚度和文化底蕴,提升话语的亲合力、感染力、说服力与传播力,以消解各类诽谤、歪曲主流意识形态的错误言论。

拓宽宣传阵地、创新宣传形式。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互联网和自媒体逐渐取代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成为社会思想表达与传播的主阵地,穿越时空限制的高频度交互性,极大增强了思想观点的传播速度和力度,对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要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从学校、社区、街道等实体领域扩大到网络虚拟平台,拓宽主流意识形态的覆盖面;要加快对传统传播模式的现代化改造,顺应时代要求在改革中重焕生机与活力;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科学分析人民群众的喜好倾向,借以打造全新的宣传形式和样态,切实提升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度和接受度。

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科学技术的进步既为思想的传播和分享提供了便利,也为不法分子发表煽动性言论、传播错误价值观念提供了机会。为此,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对网络平台和信息传播的监管力度,做到事前禁止、事中监管、事后处理“三合一”,即以法条的形式规定公民言论自由的底线、设置专门的网络信息监管部门对网民传递的信息进行审核,对于违背规定发表或传播不良言论的网民按其性质进行惩处,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另外,必须加强对公民的安全意识教育,增强公民自主甄别错误文化与观点的能力,将其培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者,错误思想观念的抵制者和纠正者。

[作者单位] 吴家庆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瞿红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文渊]

①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载于2019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② 高静《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战略思想探析》,载于《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③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页。